

每周一读

二〇二一年第 11 期（总 237 期）

百年瞬间·第一篇：中国经济特区的诞生

1980年3月24日，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、福建两省会议，检查总结此前试办深圳等出口特区的执行情况，进一步研究特区建设问题。当年5月16日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发出《关于广东、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批示》，正式将“出口特区”定名为内涵更为丰富的“经济特区”。

纪录片《共和国的脚步》：中央正式将特区定名为“经济特区”，特区主要实行市场调节，主要吸收侨资、外资进行建设。

早在1978年7月，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来到毗邻香港的广东省宝安县，也就是后来的深圳市考察调研，当时的情景，让习仲勋印象深刻。

陪同考察的原南方日报社副总编辑张汉青：四季常青，没有菜吃。靠着江河湖海，没有鱼吃。那确实那边（香港）建得很繁华，我们呢，很荒凉，冷冷清清……所以习（仲勋）书记看了以后很难受。

1979年4月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。作为中南组召集人的习仲勋提出：“广东邻近港澳，华侨众多，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，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。这方面，

希望中央给点权，让广东先走一步，放手干。”

原广东省委副书记 王全国：给常委汇报以后，习仲勋同志又带着这个意见给小平同志汇报，就讲到广东提出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嘛。这时小平同志原话这样讲：“对，办一个特区，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！中央没有钱，你们自己去搞，杀出一条血路来！”

纪录片《共和国的脚步》：1980年8月，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，在深圳、珠海、汕头、厦门设置经济特区，并批准了《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》，完成了特区设置的立法程序。

从此，深圳等经济特区一直走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，书写着激情燃烧的“春天的故事”，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重大贡献。2020年10月14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，为新时代经济特区发展指明方向。

习近平：经济特区的沧桑巨变是一代又一代特区建设者拼搏奋斗干出来的。在新起点上，经济特区广大干部群众要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，永葆“闯”的精神、“创”的劲头、“干”的作风，努力续写更多“春天的故事”，努力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！

百年瞬间·第二篇：南梁革命根据地

1934年11月7日，明媚的阳光给初冬的陇东高原带来阵阵暖意，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在甘肃庆阳华池县南梁镇荔园堡举行。大会主席台就设在关帝庙对面的老戏台清音阁，主席台下汇集着红军队伍和工农群众，锣鼓声、口号声冲破云霄。

刘志丹之女刘力贞：那个时候的选举是点豆豆，选举被选的人坐那儿，后头有个碗，点黄豆。

曾任红十六军营教导员刘懋功：后来在荔园堡开大会，这大会就宣布，习仲勋当主席，苏维埃政府主席，刘志丹军委主席。

上世纪三十年代，以刘志丹、谢子长、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，在西北地区创造性地实践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，走农村包围城市、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，先后在陕西、甘肃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，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中寻找革命的出路。他们在陕甘交界处的华池县子午岭一带发现一处山大沟深的地方，当地人称之为——南梁。

陇东学院教授曲涛：第一，南梁地区山大沟深，交通不便，森林茂密，便于红军隐蔽；第二，南梁地区是西北地区敌人最薄弱的环节，南梁的南面关中地区呢，是当时杨虎城的势力范围，它的北面陕北地区那是井岳秀的势力范围，宁夏那是马鸿宾、马鸿逵的势力范围，而南梁这个点恰恰是敌人活动的一个真空环节。

1933年，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六军进军南梁，扫荡陕甘边界的反动武装，习仲勋等人深入南梁一带的山区农村，访贫问苦，扎根串连，播撒革命火种，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具

规模，陕北、陕甘边两块根据地也逐渐连成一片，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“硕果仅存”的革命根据地，为长征中的党中央和各路红军提供了落脚点。

红色文化研究专家忽培元：就在这种远离中央的情况下，他们独立地按照井冈山的道路，按照农村包围城市这种正确的指导方针，使得这块根据地逐步地不断地扩大。

1935年9月，中央红军长征历经千难万险来到甘肃陇南哈达铺时，部队只剩下7000多人。当毛泽东接过侦察班在镇上找到的几张报纸时，兴奋地说，“感谢国民党的报纸，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消息，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红军，还有根据地。我们要抗日，首先要到陕北去！”

（文/驻沪单位党委编录）

2021年3月26日